

于洪波 等著

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史 比较研究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 东西方文明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

● 中西古代先贤道德哲学比较

● 道德理性与犬儒主义德性批判

● 美国的道德教育理论及实践研究

● 教育史学科的道德价值取向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史比较研究”（BAA090010）成果

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史 比较研究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于洪波 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史比较研究 / 于洪波等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209-07810-8

I. ①西… II. ①于… III. ①品德教育 - 教育史 - 对比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 G4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432 号

责任编辑: 周云龙

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史比较研究

于洪波 等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装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810-8

定 价 3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0546) 6441693

前 言

本书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史比较研究”(课题编号:BAA090010)的主体性研究成果。

概括而言,本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就研究范畴而言,本书属于西方道德教育史领域的“专题研究”。鉴于我国教育史学界业已对“西方道德教育通史”有诸多研究,本书仅就目前学术界尚未涉猎,抑或尚显匮乏的某些专题予以探究。专题的选择主要以诸位作者平素的研究兴趣和专长为依据,辅以对先行同类研究成果的拾遗补缺为旨归。课题组在商榷本书的撰写计划时,本来包括“道德教育转型期的断代史研究”和“道德教育类型的国别史研究”两个专题,但是经过审慎地思考和讨论之后,终因其“过于宏大宽泛”而抱憾舍弃。聊以自慰的是,诸位作者在各自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诸多尚需深入思考和探究的相关问题,激励着诸位后续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有意识地从中西文化相互观照的视角对所涉猎的专题予以分类并置和比较研究。对先行相关资料的检索表明,自新世纪伊始的晚近十余年以降,尽管我国教育史学界在西方道德教育“专题”领域取得了颇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中外道德教育的“专题史比较”研究,尚付阙如。鉴于此,本书所涉猎的十一部分,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一个尝试,期待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具体而言,本书所包括的十一部分,大致可以归于以下几个“道德教育史比较专题”:

其一,是“东西方文明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专题”。任何文明共同体的产生与发展,都必定伴随着相应道德谱系的发轫与衍变。但是迄今为止,我国教育史学界对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道德谱系研究尚处于“知其然”的境界,而对于其发生学意义上“知其所以然”的历史渊源等相关问题尚涉猎甚少。抑或说,学术界对于自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之后的古希腊城邦道德状况关注颇多,而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道德谱系的探源析流乃至与同时期我

国道德谱系的比较研究,尚付阙如。古代文明摇篮及其相应道德谱系的萌芽及其历史演变,应该是一个漫长、曲折、渐进的过程。如果我们对西方道德教育史的“起点研究”仅仅局限于从古希腊的“后苏格拉底时代”(亦即“古典时期”)开始,那么,“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①甚至更久远年代的道德遗产就会被武断地割舍和遗忘。鉴于此,本书将对古希腊文明的道德研究延伸至“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②或曰“轴心时代”(axial time)的早期,甚至更久远的年代。为此,本书专门设置的“东西方文明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研究专题”,从两个侧面对该问题予以探究:一是以“地缘文明”或称“文明策源地”为切入点,对古希腊和古中国早期文明的道德谱系起源予以追溯与比较,相对应的论文题目是“古希腊与古中国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地缘文明’的视角”^③;二是从古希腊与古中国早期神话“德性隐喻”的侧面进行梳理与对比,与此相对应的论文题目是“‘力’与‘德’的指涉及其诠释——古希腊与先秦神话德性比较的视角”。

“古希腊与古中国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地缘文明’的视角”一文,以“文明的策源地”为切入点和脉络,将古希腊与古中国分别界定为“三对”不同的文明发展形态,即“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复合文明”与“独立文明”、“城邦文化”与“宗法文化”,进而以这“三对”不同的文明形态所衍生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基础,追溯与比较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谱系原型及其基本特征。本文立论的预设前提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早在“哲学突破”的“巅峰期”^④之前,甚至于更久远

① 通达的史学研究者通常认为,古希腊历史一般分为四个时期:一是“荷马时代”(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800年);二是“古风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三是“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34年);四是“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0年)。但是,诸多晚近的研究成果大都将古希腊文明的历史延伸至比“荷马时代”更久远的“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等。参见:[美]杰克逊·J. 斯皮瓦格尔. 西方文明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6-58. 汪子嵩,等. 希腊哲学史: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13.

② “哲学的突破”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古代的希腊、印度、以色列和中国这四大文明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次“哲学的突破”。这次“突破”性的认识成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为各大文明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影响深远的原型根基。参见:Talcott Parsons, “Introduction” in Max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tr. By Ephraim Fischhoff,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pp. XXXiii-XXXV; ixii-ixiii. 另外,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axial time)的观念也与“哲学的突破”有诸多相似之处。参见: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13.

③ “古希腊与古中国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地缘文明’的视角”一文的主体部分,已经发表在《教育研究》2013年第2期。在本书中,该文在某些观点、内容和引文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拓展。

④ 这里所谓“哲学突破”时代的“巅峰期”,是指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古希腊,以“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出现为标志;在古中国,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儒、道两家的出现为标志。

的上古时期,即按照价值高低的次序分别建立起了各自独特的道德谱系。前者为:城邦的“正义”→圣哲的“智慧”→卫士的“勇敢”→公民的“节制”,等;后者为:“亲亲为大”的“仁”→“尊贤为宜”的“义”→“尊卑有别”的“礼”→“恪守仁义”的“智”,等。本文通过对这“三对”文明形态的分析与比较,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文明的萌芽期,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先祖们在与各自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精神气质”如何、私有制的演进程度以及氏族血缘纽带的强弱等等,是导致古希腊民族和华夏民族在相同的人类学前提下,走向不同的文明发展路径并形成不同道德谱系原型的根本原因。古希腊与古中国的道德谱系在根源上的殊异可以大致归结为:穷知的欲望和探索的勇气与谋求稳妥和中庸的品质;多元文化并存和开放的心态与大一统的权力和等级意识;多方协商乃至公平交易的契约精神与安土重迁以及祖先崇拜的伦理德性;“小国寡民”式的城邦自治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分封制;以法律和多元信仰而统合的“公民”与以血缘亲情和礼乐尊卑而联结的“臣民”;以“个人为本位”的法权伦理与以“家庭为中心”的奉献义务;等等。凡此种种差别,皆可从二者文明的诞生地追溯到其历史渊源,这也是二者后来按照道德价值的高低次序形成各自道德谱系的源头所在。古希腊在文明的精神气质上可称为“主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古中国可归于“主德主义”(moralism)。本文易于引起质疑抑或尚需进一步求证和探究的问题是:为了比较古希腊与古中国之间文明类型的差别,仅仅从“地缘”的视角将二者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三对”文明发展形态,与彼时“实然”的文明形态存在多大程度的切合性?由不同的文明发展形态所推演出的不同的道德谱系内涵,基本上是以“当代人”的知识和价值判断为依据而得出的,这种演绎式的推理判断与彼时的“史实”又存在着多大程度的切合性?

“东西方文明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专题”的另一篇论文是“‘力’与‘德’的指涉及其诠释——古希腊与先秦神话德性比较的视角”。人类文明的诞生,通常以文字的产生与传播等为主要标志;在此之前,人类的历史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的。在经历漫长懵懂的“婴幼儿期”之后,作为“童年期”的早期人类,开始以诧异和神秘的眼光观察自然和自身。早期人类无论在生存繁衍上,抑或在情感认知上都无法割舍对变幻莫测的“自然之母”的依恋和崇拜。地球上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生活于不同地域的早期人类,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自然崇拜样式和神话传说。神话传说,可谓人类初期文明遗留至今的最古老、最珍贵的“精神奇葩”和“心理标本”,其中隐含着人类先祖们幽远神秘的“德性密码”尚待

溯源和解读。晚近几年,笔者曾数次尝试撰写一篇名为“古希腊与古中国神话的道德隐喻研究”的学术论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终究没有如愿以偿。由刘军豪撰写的“‘力’与‘德’的指涉及其诠释——古希腊与先秦神话德性比较的视角”一文,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笔者这方面的遗憾。该文以短小精悍的篇幅,对晚近三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中希神话学比较领域一个几成定论的观点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先秦神话“尚德”,而古希腊神话“崇力”。该观点尤以当代学者谢选骏在《神话与民族精神》一书第五章“民族精神的表现”所概括的最为典型,即中国神话体现的民族精神是尊“德”;希腊神话体现的民族精神是崇“力”^①,而此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之后对中西方神话的比较研究。刘军豪先从“尚德”与“崇力”所从属的“上位概念”逻辑分析入手,指出二者在是否“可比性”的问题上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以及尚待探究的因素。继而,该文从“力”与“德”概念的内在联系、华夏文明道德的“早熟性”及其“伦理本位”、古希腊文明道德的“渐进性”及其“理智道德”和“伦理道德”的“兼容性”、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在东西文明中占据的不同位置、古中国“私德”与古希腊“公德”的比较等方面,对中希神话中“德”与“力”的二元属性进行了“还原式”质疑和条分缕析。该文最终的结论是:“相对于‘崇力’和‘尚德’的简单划分,更为恰当的表述似乎是:古希腊崇尚‘正义的力量’,而先秦崇尚‘有影响力的道德’;其实,当我们将焦点过多地会聚于‘力’和‘德’而试图刻意地去发现两者的对立和不同时,我们本身已经错过了发现两者内在联系的机会。”该文并非对希腊和中国上古神话全方位的研究,而是对先行的某种学术定论悬疑出发,进而立题成章的。该论文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是:其一,古希腊和古中国上古神话“本然的”内涵及其德性隐喻是什么?其二,这种内涵及其德性隐喻“实然的”历史成因何在?其三,对上述两个问题应当采取何种“应然的”德性价值判断与比较?

其二,本书的第二个专题是“中西古代先贤道德哲学比较”。如果说上述第一个专题“东西方文明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所探究内容的历史时限早于“哲学的突破”时代的话,那么第二个专题“中西古代先贤道德哲学比较”所研究对象的历史时限则恰好处于“哲学突破”的时代。在公元前的一千年内,古代的希腊、印度、以色列和中国这四大文明中心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哲学突破”。这次“突破”性的认识成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各大文明日后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外学术界在探究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历史渊源时,通常所

① 谢选骏. 神话与民族精神[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208-234.

谓的“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中国人言必称先秦”，大凡概因中西两大文明分别起源并奠基于古希腊的古典时期和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彼时，自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之后，古希腊的“人间哲学”得以空前的长足发展。与此同时，古中国在经历西周末期“礼崩乐坏”的大变局之后，各家诸子争相“托古论道”，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当时的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老庄，作为“哲学的突破”时代东西方文明源头的开创者，以其博大精深和开创性的言说方式和内涵，为日后两大文明道德哲学的发展建构了坚实的根基。故而，任何对东西方文明传统道德哲学予以探究和比较的话题，都不能绕开古希腊与先秦时期的诸位哲学先贤。鉴于此，本专题有针对性地设计并撰写了三篇论文：一是“由‘君子’‘小人’到‘中民’‘公民’——由世袭‘位格’到道德‘人格’的转变”；二是“道德是否可教——中西先贤关于人性论之比较”；三是“在‘内圣外王’与‘自然而为’之间——柏拉图与老子道德哲学比较”。

“由‘君子’‘小人’到‘中民’‘公民’”一文探究的基本路径是，在考察孔子将“君子—小人”由原来代表身份等级的“位格”转变为道德善恶的“人格”之后，继而借用西方学者“哲学突破”的理论深入探究“君子—小人”的原型内涵，进而以通篇《论语》为依据提炼出“君子—小人”学说的基本特征，最后探究其对现当代“中民”（指“普通人”或“常人”）或者“公民”德性养成的转换价值和意蕴。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晚期，孔子关于“君子—小人”的学说，创造性地完成了两大“托古创新”式的转换与超越：一是通过将“君子—小人”由原来“封土建邑”而形成的代表政治身份的“位格”等级制度，转变为评判道德善恶的“人格”伦理准则，从而打破了以世袭等级制度评判“上下尊卑”的传统格局，开启了相对平等的道德善恶评价风尚；二是通过赋予传统的“礼”以“仁”的合理内核，超越了当时由于“礼坏乐崩”而走向形式化的“礼仪”流弊，使“形下”的“礼”之“器”，具备了“形上”的“仁”之“道”，使“君子—小人”的立论获得了具体而又普遍的“体用”特征。这是原始儒学有关“君子—小人”的伦理价值判断能够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保持昌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若从现代道德权利与义务统一的视角予以审视，原始儒家关于“君子—小人”的传统人格内涵，在经过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可以转换为下列养成现代“中民”和“公民”德性的有利资源。首先，在人己观上，由“君子—小人”在“利他”与“利己”之间的对立，到“中民—公民”向“人己两利”观念的转变；其次，在义利观上，由“君子—小人”在“义”与“利”之间的对立，到“中民—公民”

向“义利兼顾”观念的转变;再次,由“君子一小人”“外礼内仁”的德性陶冶,到“中民一公民”“公正意识”的养成;最后,由“君子一小人”在“志于道”和“怀惠”之间的区别,到“中民一公民”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前提下超越精神的转变。

“道德是否可教?”一文以中西方先贤关于“人性”的诸种理论及其比较为切入点,探究一个中外道德教育发展史中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道德的可传授性如否。人性,就是一切人都具有的属性,人存在的理由。通过人性彰显最终体现其完美的存在;抑或说,人性得已足够绽放,得以自我实现。人性论,则是关于人性本质特性的论断。它包含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性论预制了道德学说,有么样的人性论就有么样的道德观和道德实践。中西方先贤们关于人性论的不同见解,导致了在道德及其教育构建上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理路和伦理文化的差异。通过对中西方不同道德观念及其教育方式上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的道德教育提供思考和借鉴。该文在对“人性”和“人性论”这两个概念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以两条主线对于中西方先贤的人性论予以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其一,是以中国古代关于“仁”与西方关于“理”的观念为比较线索。在这条比较的线索中,该文对中西方举世闻名的诸位先贤进行了全景式的回顾比较,并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仁”与“理”不同的人性论对东西方道德教育的规范和指导意义。在由人性论而推演出的道德观念及其类型上,中国的传统可称为“主德主义”(moralism),而西方可归于“主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其二,是以宗教“神学”和世俗“人学”为线索对中西方的“人性论”予以比较分析。与西方文化的神学特质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调日用伦常的世俗文化。正如章太炎在论及华夏民族的国民性时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①应该说,从西方“神学”与中国“人学”比较的视角对中西方先贤的“人性论”及其道德教育理念予以探究,在我国教育史学界尚不多见。该文在该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最终表格的形式归纳总结出了“中国‘天一人’与西方‘神一人’人性论及其与德育内涵的比较”。最后,该文对东西方道德哲学先贤的人性论及其教育理念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并概括出“道德是否可教”对于二者不同的意蕴。该文的可嘉许之处在于其资料的详细性和线索的清晰性,但是尚缺乏对基本史实的融会贯通把握以及紧扣主题的分析。

本专题的第三篇论文是“在‘内圣外王’与‘自然而为’之间——柏拉图与老

①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政论选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7:689。

子道德哲学比较”。如果说本专题的第二篇论文“道德是否可教?——中西先贤关于人性论之比较”是对中西方传统道德哲学进行全方位比较研究的话,那么第三篇论文的立题则试图通过“一滴水见太阳”的方式,对柏拉图和老子的道德哲学予以深入细致的比较探究。该文题目中的“内圣外王”源自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①,用来指涉柏拉图教育“理想国”的终极价值诉求——“哲学王”(philosopher-king)的培养;用“自然而为”概括和指涉老子的道德哲学思想。众所周知,古希腊“三哲”之一柏拉图与中国传统哲学开山鼻祖之一老子在道德哲学上各有建树。前者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道德的来源,并借助“神”的力量成功地将城邦道德移植到城邦的个体公民,进而制定出了发展和完善道德的周密教育计划,明确地指出了教育过程中的内容与方法,最终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了活生生的道德楷模的形象。后者则以其“道”之自然特性为依据,依靠“道”的工具属性,将自然中具有的美德与个体所应具有的美德作对应,以“道无为”为理论依据,指出了无为的“不言之教”对于发展和完善道德的重要意义,最终亦成功地塑造出了形象鲜明的道德典范。本文开篇从“社会安定”“生存保障”和“美好生活”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认为柏拉图和老子道德哲学共同的价值诉求,可以用中国的传统话语——“明道救世”来概括。本文的第二部分在对二者“道德的来源及其转换”分析的基础上,较精确地把握了二者的本质差别:柏拉图道德哲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城邦”,进而推及“公民”;而老子道德哲学的源头则是“自然”,进而推及“个体”。二者在道德哲学认识论上出发点的殊异,必定导致他们在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侧面的不同。随之,该文第三部分对柏拉图的“有为”之教与老子的“无为”之教的内涵及途径进行了比较。最后,该文对二者道德教育的目的和结果予以了归纳和总结。柏拉图道德哲学“理想国”的目的是培养精英的“哲学王”;而老子道德教育的“理想国”则是“人人皆可为圣人”。柏拉图的“哲学王”像“太阳”那般光彩夺目,始终站在金字塔的最高端,以荣耀的姿态,依靠无上的权力以及天赋优越的德性,统领芸芸众生,统辖万般事务。相比之下,老子的“圣人”像“水”那般润物细无声,表面好似唯唯诺诺地行事为人,实则忘却功名,忘却自我的存在,“以百姓心为心”,默默地润化着社会人事。该文作者以开阔的思路对柏拉图和老子道德哲学的微言大义赋予了精细的思考和比较,但是对于二者所处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影响尚需致力研磨。

其三,本书的第三个专题是“道德理性与犬儒主义德性批判”。本专题由两

① 《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篇论文组成:一篇是“西方道德的理性追求及其反叛——以‘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为线索”;另一篇是“后现代犬儒主义的道德哲学批判——以存在论的阐释为视角”。本专题的两篇论文尽管在探究的内容上看似相对独立,但是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二者又彼此相关。从横向的历史发展来看,前者以“知识即美德”为线索探究了西方自古代至现代道德理性及其反叛的发展历程,而后者则对后现代西方道德的犬儒主义哲学予以分析和批判,二者存在着历史发展脉络的延续性。从纵向的空间选择来看,二者都属于对欧洲道德教育发展脉络予以探究的主题。就本专题的第一篇而言,西方古代道德原则以神话故事为线索,以“天上的知识”为载体,后经智者“从天上拉回人间”之后,道德知识不再具备彼岸的绝对性。雅典城邦日趋衰落,道德行为逐步滑坡。苏格拉底为了改变城邦道德沦丧的困境,努力将道德拉回到人间的理性世界,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即美德”命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道德的内涵。从此,对道德理性和道德幸福原则的探究,业已成为古希腊先贤们的风尚。道德的问题无法摆脱知识的问题,知识又无法回避“是什么、从何而来、何以为是”的问题。如此一来,又难以越过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之间的探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及其继承者,主张道德建立在经验和情感的基础上。大陆理性主义和剑桥柏拉图主义的拥趸,强调理性对道德的引领作用。前者利用分析和描述的手段揭示道德原理;后者则利用演绎与推理的方式为道德正名。知识可能不会直接导向美德,但是美德却不能缺少知识。终归没有知识审查的德性是肤浅的,也绝非藉由情感体认、日常躬行和理性升华后“应然”的美德。本文尚需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在中世纪一千年神学的主导下,道德理性与宗教信仰采取了一种怎样的消长折中和融会贯通形态?其对于当时的道德教育产生过何种潜在的影响?19世纪末在欧洲发源的“新教育运动”,又对彼时的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产生过何种“实然”的影响?

本专题的第二篇论文对欧洲后现代的犬儒主义道德哲学予以分析和批判。本文认为,犬儒主义浸淫并侵袭理想、意义、前途、传统等等,致使价值变得恍惚、淡化,导致文化生态素养的低俗化。犬儒主义业已成为后现代性的时尚,它终结了真理、进步等德性价值传统,并将导致非理性、非中心、非本质、非基础等特征,它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消极主义”及“功利主义”,蕴涵着反文化、反确定性,并导致虚假主义、冷漠主义、折中主义、相对主义、享乐主义、怀疑主义乃至虚无主义,进而影响了现代教育应有的和本然的价值诉求。犬

儒主义引导了低级教育价值以致无价值,让教育不再背负道德“意义”的重担。教育价值的寻获必须从对犬儒主义教育价值的批判入手。这是超越后现代压力追寻意义所必需的超越,也是教育价值真正方向的可能方案。本文尚需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是,犬儒主义作为策源于古希腊的一种道德哲学观念和流派,其在中世纪和近现代发展的大致脉络是什么?既然犬儒主义被某些人作为其人生的道德哲学,那么其哲学观念包括哪些本质特征,其外显的日常人生道德行为又包括哪些侧面?

其四,本书的第四个专题是“美国的道德教育理论及实践研究”。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诸发达国家中,美国向来以教育理论的勇于创新和教育实践的大胆探索而著称,其教育理论的流派纷呈辈出,教育实践的拓展大刀阔斧。在美国诸多的道德教育理论中,本专题选取了当下对其道德教育影响较大的“批判教育理论”中的两个代表人物——吉鲁(Henry A. Giroux, 1943—)和阿普尔(Michael W. Apple, 1942. 8—)予以深入探究。就美国的道德教育实践而言,本专题选择了美国自建国之初至今一直富有特色并且始终主导地位的“品格教育”为探究的主题。本专题包括三篇论文:一是“批判意识与教师的德性——吉鲁眼中教师的美德”(下文简称“吉鲁”);二是“意识形态的‘遮蔽’与道德‘解蔽’——批判教育学家阿普尔的德育理念”(下文简称“阿普尔”);三是“美国中小学品格教育的理念与策略——历史发展与比较借鉴”(下文简称“品格教育”)。

首先,介绍“吉鲁”一文。亨利·A. 吉鲁是美国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文化研究者,批判教育学代表人物。吉鲁认为,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应当把教育教学看做是具有更广泛的民主和道德事业的组成部分,给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道德素养,以鼓励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批判的社会能动者,并且赋予他们能力以超越他们已知的知识和道德世界,进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人性道德世界。他的教师观揭示了教师工作的政治意义和德性意蕴,主张教师使用批判教学法来发展学生的批判意识、鼓励教师在与学生平等的对话中开展教学和道德实践,进而构建一个更加民主公平的世界。吉鲁的批判教育理论中所蕴涵的道德教育价值与我国传统的关于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具有文化根源上和理论上的比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也正是该文在后续研究中尚需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其次,“阿普尔”一文,可称为“吉鲁”一文的姊妹篇。与吉鲁一样,迈克尔·阿普尔也是当今美国批判教育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79年,阿普尔出版

了《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该书的出版确立了他作为一名批判教育学者的地位和影响力。此后他笔耕不辍,活跃在美国乃至国际教育的舞台,展现出禀赋创新精神的“批判教育家”形象。阿普尔批判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学术渊源以及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阿普尔认为,美国的学校课程和道德教育并非客观中立,而是受到美国右派联盟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包括新自由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威权民粹主义者及专业和管理主义者。他们把各自的道德传统和观念渗透到学校道德教育尤其是德育课程中,并使其合法化乃至主流化,并且排斥和压抑其他非主流群体的道德文化和话语。阿普尔认为,要从这种意识形态的压抑和控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让人们意识到这种貌似合理控制的不公正之处,从而在共同的善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形成反右派联盟;在批判教育理论的指导下,确知各自的道德立场,为社会公正和教育民主切实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挑战。阿氏的批判教育理论及其德育理念,对于我们反思并建构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和道德教育的蓝图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本文尚需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是,阿普尔对“学校教育中霸权意识形态的剖析和批判”,对于我国目前学校道德教育中的某些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诸如,道德权利与义务、美德伦理与底线规约、应该与正当、无私利他与己他两利,等等,有哪些可以深入比较和借鉴的意义?

最后,“品格教育”是一篇专门梳理和研究美国道德教育实践的论文。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是当今美国学校道德教育的主流形式之一。学校通过与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合作,有意识地传授给学生核心价值观,使学生成为有一定道德标准的公民。从第一所公立学校建立开始,品格教育就成为美国学校的主要教育任务之一。到20世纪初期,品格教育已发展成为一项运动,在美国中小学广泛开展。二战后,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美国的品格教育渐趋式微。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青少年的道德每况愈下,诸如,早孕、吸毒、自杀、暴力等现象日趋严重。至此,公众和教育界重新认识到品格教育的价值;90年代以后,品格教育又发展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美国的品格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内容、原则和方法体系,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品格教育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资源。倘若从借鉴和比较的角度来考量,美国的品格教育与我国的道德教育,在理论观念和现实举措上有哪些异同点?这是本文尚需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其五,是“教育史学科的道德价值取向研究”专题。称之为“专题”,或许名不

副实,因为它仅仅是一篇小文。如果从学科来划分,本课题属于教育史学的研究领域。笔者从事教育史研究和教学廿年有余,一直以来对于“教育史学科是什么”和“教育史学者是谁”以及二者“应然”的关系何如等等相关问题,有颇多的感想和困惑。几经反复揣摩和思考,终于形成“论教育史学者的淑世致用情怀——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阈”一文。或许,仅就字面所涉来看,本文与道德尤其是道德教育没有直接关联,但是本文所探究的几个问题及其所蕴涵的弦外之音,皆与教育史学者在从事教育史学研究中所“应然”秉持的“真—善”判断和价值有关。该文通过对中西方知识分子在知识论方面的历史回顾,梳理了“明道”(求真)与“救世”(致用)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中西方教育史学者的影响。通过对教育“信史”和教育“良史”的界定等,从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问题关注的视角,论述了作为学院派的教育史学者在立足既往客观史实的前提下是否应当和如何关照现实问题,并对应然的现实价值取向等问题予以初步的探讨。本来试图论证的基本立题是,如若教育史学要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其立足点首先应该是“最彻底的专业化”,以教育“信史”之“真”关照和审视当下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教育“良史”之“善”的德性价值取舍,对相关的现实公共问题予以评判和呼吁,从而达到“明道救世”的道德价值诉求。本文已发表于《教育学报》2011年第2期,本书中所呈现的本文,又增加了“由‘道’到‘德’”为二级标题的部分。我国学术界某些学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类似于西方哲学中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等相应的概念和内涵。该部分即是由对这种观点的质疑而写成的。笔者认为,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道家的“道”和佛学中的“如”,甚至儒家的“仁”等,就是西哲所指的“本体”“物本体”和康德所说“物自身”。其实,寻找和探索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道”或曰“本体”的概念及其内涵,对于“道德”中“德”的理解和建构是至关重要的。正如该部分所言:晚近几年,愈加觉得释家的“如”、道家的“道”和西哲的“本体”等概念,蕴涵着诸多“神性之本然”的意味。对于这种“神性之本然”,或许既需要实践理性的淬炼,又需要不懈的“求真”和虔诚的“信仰”;或许唯经藉此,方可导入并接近蕴涵“神性之本然”的“如”“道”“仁”?或许,进而会形成构建更适合于我国道德内涵的另一维?

本课题从开题到书稿的撰写,都得到诸多同行专家和山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及其相关领导帮助和支持。课题组成员金传宝、李忠、路书红、郭玲等与课题主持人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神,为本课题的顺利完成奉献了宝贵的辛劳和智慧。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在资料查询和论文写作等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本书由于洪波、路书红、郭玲、王康宁校对。本书的出版得到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责任编辑周云龙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诸多辛劳。在此,我们谨表示由衷的谢意。书中纰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识者不吝指正。

于洪波

2013年6月13日

目 录

前 言	001
专题一 东西方文明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	001
古希腊与古中国道德谱系溯源及比较	
——“地缘文明”的视角	003
“力”与“德”的指涉及其诠释	
——古希腊与先秦神话德性比较的视角	019
专题二 中西古代先贤道德哲学比较	027
由“君子”“小人”到“中民”“公民”	
——由世袭“位格”到道德“人格”的转变	029
道德是否可教?	
——中西先贤关于人性论之比较	043
在“内圣外王”与“自然而为”之间	
——柏拉图与老子道德哲学比较	084
专题三 道德理性与犬儒主义德性批判	111
西方道德的理性追求及其反叛	
——以“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为线索	113
后现代犬儒主义的道德哲学批判	
——以存在论的阐释为视角	137

专题四 美国的道德教育理论及实践研究..... 149

批判意识与教师的德性

——吉鲁眼中教师的美德..... 151

意识形态的“遮蔽”与道德“解蔽”

——批判教育学家阿普尔的德育理念..... 180

美国中小学品格教育的理念与策略

——历史发展与比较借鉴..... 211

专题五 教育史学科的道德价值取向研究..... 255

论教育史学者的淑世致用情怀

——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阈..... 257